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科學

季評

二〇〇四年 三月 第一期

2004 MARCH NUMBER 1

QUARTERLY

BOOK REVIEW

目次

〈書評〉

- 夏曉鶯 《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 陳毓麟 1
- Robert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林廷輝 3
- Ron Suskind *The Price of Loyalty: George W. Bush,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Education of Paul O'Neill* 柯斯安 (Christian Schmidt) 6
- Anne Orford *Read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連澤 (Tse Lien) 9
- 張亞中 《開放政治市場》 李清 12
- David Shambaugh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廖小娟 15
- 凌志軍 《變動：六四至今的中國社會大脈動》 林琮盛 17

〈書目〉

- 米歇爾·福柯 《性經驗史》卷一：認知的意志 邵軒磊 20
- 藤原埭一 《民主帝國：美國、戰爭現代世界》 葉俐吟 22
- David Goodman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曾拓穎 24

政治科學季評

二〇〇四年三月 第一期



- 資深編輯顧問 高朗、石之瑜
- 編輯顧問 王順文、莊國銘、廖高賢
- 主編 陳俊華
- 編輯委員 林呈曦、陳蔚芳、曾隆盛
楊立彥、劉建宏、戴天楷
- 校外編輯委員 林御翔、曾拓穎
- 發行單位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地址：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

電話：(02) 2391-8756

夏曉鶻

流離尋岸： 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

陳毓麟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階層性的自我/他者界線是社會秩序再生產的基礎，而「交會」(Betweeness) 是打破保存循環的破門磚。」(頁 248)

優越自我與低劣他者的建構是相互平行的，在建構後者的同時，主流社會也就把自己想像成優越的，被他者所威脅的。「他們」成為「我們」要解決的問題，而「外籍新娘」與她們的台灣丈夫正是這低劣陣營的一份子。

本書第三與第五章中，作者解構此一社會問題的生產過程，她認為社會真實是建構而來的，我們可以找到多個敘述的版本，然而僅有一種版本能享有被定位成真理的特權，其他版本都被消音了。例如在官方與媒體的論述中，東南亞外籍新娘與台灣丈夫的婚姻被界定成問題重重：假結婚真賣淫、家庭破碎、降低人口素質，男性多是身有殘疾、大男人主義、水準低落，是社會的失敗者，女性的圖像則是無力的受害者或唯利是圖，或者有害治安。這些敘事都帶有歧視、偏見，選擇性的建構出低劣他者的形象。

然而僅僅解構論述是不足的，作者認為這類商品化的跨國婚姻必須與國際與國內階級、性別、族群的階層化現象連結。具體而言，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邊陲與半邊陲國家內部的不均衡發展使其中被邊緣化的男女藉國際婚姻謀求出路。東南亞「外籍新娘」因為其母國的不發展，為尋求經濟出路而遠嫁外國，她們的台灣丈夫則是那群因為經社地位較低而在本國婚姻市場上競爭力不足的弱勢者。作



書名：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
「外籍新娘」現象

作者：夏曉鶻

出版者：唐山

出版地：台北

出版日期：2002年3月15日初版

頁數：269頁

ISBN：9578221827

者指出這些人多在 30-40 歲以上，職業以工農為主，在傳宗接代與家庭需要下進入跨國婚姻（第六章）。然而這種功能性與利益交換取向的婚姻並不符合中產階級的浪漫品味，這些人因此被認為不懂婚姻的真諦。對此作者引用 Bourdieu 的理論指出人們對婚姻生活的理想實深植其所處的社經階層地位，而婚姻原本亦具有利益交換的性質，若忽略此一事實而將婚姻浪漫化、自然化則是無視於社會中的階級差異與不平等的存在（頁 231-235）。

另一方面，弱勢者也會協助複製此一不平等結構。被壓迫者不但具有受壓迫的意識，也會內化壓迫者的意識。第四章顯示外籍新娘認為母國男性的好逸惡勞和喜新厭舊是他們遠嫁國外的原因之一，而台灣男子則怪罪本國女性的功利取向，二者都未意識到不平等的發展是他們受壓迫的主要因素，反而怪罪其他的弱勢者。除此之外，這些台灣男子也會接受主流社會對跨國婚姻的負面看法，但自己是例外，於是他們也參與並複製了社會建構低劣他者的過程。

為了打破這個循環，作者提出交會的概念，也就是要看到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連性，從類似的經驗出發設身處地的體會他者的處境，將有助矯正原有的偏見和歧視（頁 248）。另外為了改變社會結構，實踐也是不可缺少的，所謂實踐指的是有目的的行動，其目的在於改造物質世界與社會，以及人類本身。作者採取的實踐式研究法就是以研究干預社會，以賦權（empower）予被消音的研究者（頁 39-40）。透過實踐，限制行動的結構不再是僵固的 structure 而是動態的

structuring（頁 226）。外籍新娘識字班正是作者積極介入的研究與實踐場域。然而要對抗對弱勢者威脅最大的資本主義洪水，以免更多的人陷入流離失所尋岸棲身的處境，國際連結與合作是必要的方式。

書中每一章的開頭都是作者生命經驗的自省，從中我們看到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經驗的交會，這些生命經驗不但開啟讀者思考與感受的可能性也傳達作者本身的熱情。不過書中的某些觀點可能會引起異議，作者對性別不平等的現象與父權似乎過於寬容，並且將問題化約至階級的面向上，而識字班的開設更有鼓勵外籍新娘買賣、保存父權結構的功用。對此質疑，作者認為人的信念與價值觀都生根於他所存在的社會場域，外籍新娘與她們丈夫的價值觀跟其他人都一樣正統。改變社會現實的機制必須來自培力（empowerment）、理解與實踐，藉由培養外籍新娘的自主能力與社會網絡改變她們與先生的依附關係。

然而研究者在介入時也可能犯下錯誤，使實踐走樣。對此作者如此回應著：「每個人的生活都帶著風險。和每個人一樣，學者的風險總是與錯誤、不當、愚蠢及太過簡化有關。實踐式研究讓研究者更真實面對作為人的熱忱、焦慮、恐懼，而不再滿足於以學術包裝的冷漠。（頁 227）」

在研究的領域之外，我們也可拿這段話時時提醒自己。在日常生活的交會與實踐中，無論過程有多少愚蠢、焦慮、恐懼，我們都可以打破階層性不平等的複製過程，熱忱的建構出一個平等而多元的、更適合人居住的世界。◆

Robert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林廷輝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2003 年第二次美伊戰爭，歐洲國家與美國對處理伊拉克問題有著不同態度，雙方立場漸行漸遠，特別是法國及德國選擇背離美國強權競逐的道路，走向自我克制的政策，希望透過協商、合作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實現哲學家康德 (Immanuel Kant) 所描繪的「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 的世界。但美國認為國際法規並不足恃，在「霍布斯」(Hobbesian) 無政府主義橫行的利己環境中，要維護國家利益，便不得不走向建軍，擴大自己勢力以求自保。對於美國及歐洲在冷戰後的新世界秩序中自處的方式迥異，有人將之歸咎為雙方哲學觀的不同，而 911 事件的發生讓彼此間歧異的立場更加明顯。

由凱根 (Robert Kagan) 撰寫的「偏安一隅與軍事強權：新世界秩序中的歐洲與美國」(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乙書，探討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歐洲與美國不同的歷史經驗為基礎，就權力與威脅層面進行分析，提出未來大西洋兩岸國家如何相處。凱根為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美國領導計畫」(U.S. Leadership Project) 主任，曾於 1984 至 1988 年任職美國國務院。本專著則由美國科諾夫出版社 (Alfred A. Knopf) 出版，全書共計 112 頁。

凱根認為，冷戰結束後，大西洋兩岸彼此對於「什麼是最值得關注的新興威脅」，存在巨大的差異，美國口中所謂的「流氓國家」(Rogue States) 或



書名：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作者：Robert Kagan

出版者：Alfred A. Knopf

出版地：New York

出版日期：2003 年 1 月 28 日初版

頁數：112 頁

ISBN：1400040930

是「邪惡軸心」(Axis of Evil) 國家，是威脅的來源；而歐洲人對威脅來源則認為是「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 而非「流氓國家」。歐洲對威脅的容忍度較高，較佳的解釋應該是相對國力的衰退，強國與弱國在面對威脅的心態上是不同的，美國人談的威脅是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恐怖主義以及流氓國家等等」，歐洲人眼中的「挑戰」指的卻是「種族衝突、移民、組織犯罪、貧窮及環境惡化。」因此，關鍵的差異不在文化或價值觀的差異，而在於國力。在解決這些威脅的方法上，歐洲傾向以國際法及國際組織來解決爭端，但美國則擔憂過多的規範會使自己無法施展本身的力量，因此需要靠權力與國力來提供安全及繁榮。

美國採取單邊主義 (unilateralism)，歐洲國家雖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但歐洲卻不願去承認一項事實：他們對於單邊主義的敵意是基於自身利益。由於歐洲各國普遍缺乏能力，無法採取單邊主義，因此強調以多邊主義和國際法，採取高報酬，低成本的做法。不過，目前的狀況卻充滿諷刺的現象，歐洲之所以能反對強權政治與降低軍事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主要是美國在歐洲的駐軍，簡單來說，歐洲的康德秩序之所以能夠成功，卻須歸功於美國遵循霍布斯秩序法則的運作。不過現在歐洲國家認為美國軍事力量及其戰略文化是過時且危險的，這種思想卻成為主流。

面對這樣的困境與難題，英人庫柏 (Robert Cooper) 提及面對此事實時，必須習慣這種後現代世界 (指今

日的歐洲)，能以雙重標準來看待，他認為歐洲各國間可以法律運作方式開拓合作安全管道，但在歐洲以外的地區則採取較為粗暴的方式。於實踐上，英國首相布萊爾曾嘗試將歐洲帶回霍布斯世界，強調軍事力量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角色，但布萊爾希望將整個歐洲拖下水的想法並沒有成功。美國布希總統對伊拉克採取武力時，德國總理施若德 (Gerhard Schröder) 及法國總統席哈克 (Jacques Chirac) 成為最反對美國的國家，伊拉克問題使大西洋兩岸的問題赤裸裸的浮上檯面，這歧見在作者眼中看來將隨著時間漸趨緩和。美國與歐洲對權力不同的看法，未來將也會稍微淡化，共同政治文化和經濟關係將又獲重視，直到下一次國際危機爆發為止，才又會出現。至於冷戰時期所謂「西方陣營」，是否會在繼續？作者認為歐洲和美國並不會發生「文明衝突」，反倒認為歐洲應該去適應「美國霸權」這個現實，他引述心理學家經常用的言語：管理問題的第一步就是了解問題，並且承認問題的存在。

凱根於書中最後一部分主張歐洲對美國不應感到畏懼或憤怒，反而要記得一個強大，甚至具有支配優勢的美國，對世界，對歐洲的重要性，他認為美國可以提供歐洲一個康德式的新樂土，為此新樂土而付出的代價，歐洲應該可以接受。他引用庫柏 (Robert Cooper) 的話表示，少數歐洲人承認，美國這樣的行徑反而較有益於文明世界，美國的勢力，即使有雙重標準，或許仍是促進人類進步最佳的方法，可能還是唯一的方法。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稱美國「解決

世界問題的責任」，以「無所限制的力量」因應所有的危險，「為全球社會提供一些真正的利益」。凱根認為歐洲各國應該要有這樣的思維，而美國方面則無須認為自己被束縛，他主張美國應跳脫因不正確制約感而產生的焦慮，展現更了解他國的態度，多一些過去在冷戰時期外交上的慷慨精神，適時對多邊主義和國際法表示尊重，建立國際政治資本，如此，雙方才不會日益疏離，漸行漸遠。

美國與歐洲對國際事務處理態度不同，論者常以雙方不同的哲學思想及戰略文化來探討歧異所在，不過作者卻點出了造成彼此對國際事務作為不同的最大原因，也就是在於權力的強弱，做為霸權國家的美國當然想尋求更為安全的國際環境，據霸權穩定論學者的說法是，霸權國家除靠其威懾力來維持秩序外，主要是依靠國際規則來管理世界事務，而霸權同時是此種規則的制定者、維持及執行者，美國現正在建構這種規則，但常與歐洲國家認知的傳統國際法是有所衝突的。本書作者欲把美國的行為正當化，他認為美國與歐洲在文化差異上並無不同，雙方發生齟齬是在權力方面，因此歐洲應該採取雙重標準，在國際上去支持美國，只有支持美國的霸權力量，使其穩定外在國際環境，歐洲各國方能在歐洲領域內創造一個康德式的樂土，不過，此時的歐洲是否要遵循美國所建構出的國際典則（International Regime）與規範？還是適用本身認知的規律？則是歐洲進入美國霸權環境中未來更需面對的挑戰。◆

Ron Suskind

The Price of Loyalty: George W. Bush,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Education of Paul O'Neill

柯斯安 (Christian Schmidt) /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關組

自 2001 年布希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其施政風格與政策即備受爭議。然而，身為決策的局外人，一般對布希的議論，只能針對決策的結果與政策來進行分析或評估，對決策產出的背景則無從了解。奧尼爾 (O'Neill)，身為美國前財政部長，曾在美國政府部門中最有威權性的財政部任職兩年，最後因減稅問題上與布希理念不合而被迫去職。辭職後的奧尼爾將其在白宮內任事兩年的經驗，加上近兩萬份的政府機密文件與檔案，提供給曾獲 Pulitzer Prize 的蘇斯坎德 (Ron Suskind) 寫成《忠誠的代價》(The Price of Loyalty) 一書。

《忠誠的代價》一書因揭露白宮內部不為人知的秘辛而受到高度關注，並被視為近年來對美國政府最激烈的一股打擊，尤其本書對白宮內部荒唐的決策背景與過程之描述，更令全球觀察美國外交的學術界和媒體瞠目結舌。以下將先簡短地介紹本書主要處理的三大議題：包括美伊戰爭的決策背景、從重大政策的決策過程檢視布希的領導能力、以及奧尼爾對其辭職的原因做自我辯護。

一、關於美伊戰爭

根據奧尼爾所提供的官方機密文件，對伊戰爭早在布希上台不久後已作為美國第一秘密外交策略。布希政府於 2001 年元月時，在國家安全會議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中，就曾考慮使用武力推翻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在一份會議參考的機密文件資料中，竟有關於「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



書名：The Price of Loyalty: George
W. Bush,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Education of Paul
O'Neill

作者：Ron Suskind

出版者：Simon & Schuster

出版地：New York

出版日期：2004 年 1 月初版

頁數：349 頁

ISBN：0743255453

重建計畫，而唯一的讓布希頭痛的是：他根本沒有打伊拉克的藉口，就連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特內特（Tenet）也無法提供任何可支持美國發動對伊戰爭的資料。

雖然 911 事件的發生對美國而言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悲劇，但對布希政府而言卻也是一個危機中的轉機，因為美國終於獲得發動對伊戰爭的藉口，也獲得擴大其單邊主義的機會。經由本書作者蘇斯坎德精采描述，讀者可發現在美伊戰爭的幕後決策過程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為主導該議題的國防部長與副部長兩人，其他支持者則為被說服、威脅或洗腦的內閣閣員與國會議員，而前財長奧尼爾則保持腦袋清晰，對美伊戰爭保持懷疑立場。

經由國際關係領域的課程訓練後，研究者在分析外交決策時，往往會利用各種不同的決策模式來探就幕後的決策過程，然而，實際的決策過程與理論上的分析模式間往往存在落差。以本書所描述之布希政府對伊政策的決策過程為例，決策過程不但封閉、不理性、違反常理，布希甚至被批評為「如同一個盲人在一群聾子中間穿行」。

911 事件後，倫斯斐即快速列出了中東地區內 27 家恐怖組織或危險人物，指稱這些恐部分子與伊拉克政府間具有密切關係，並表示伊拉克支持蓋達（Al Qaeda）恐怖組織。不過，參與國安和內閣會議的奧尼爾則透露，布希所參考的資料並不足以證明伊拉克和其他恐怖組織有任何關係，相反的，CIA 機密報告中指出伊拉克與回教組織間存在長期的對抗和衝突，海

珊本人寧死也不願支持沙烏地阿拉伯或阿富汗的任何恐怖組織，然而此事實由於不利於布希的戰爭計畫而刻意受到忽略。另外，倫斯斐也曾在一份關於美國的國防戰略報告中提到，由於在後冷戰時期，美國可能受到其他國家以核生化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挑戰，因此美國需進行預防攻擊，證據則留待以後再說，決策不但輕率且狂妄。

二、布希的領導能力

在布希的領導能力部份，蘇斯坎德引用奧尼爾和與其他人提供的資料來描述多次白宮幕後的會議過程，且將布希形容為一個愚昧無知的，完全依賴他人看法而下決定的無能者。讀者可回憶布希剛上台時，曾在演講時發生不少口誤，引起各國對美國外交的新方向感到猜疑與不定，也擴大各方對美國外交走向的詮釋空間。然而在閱讀本書時，讀者竟然可以發現，美國總統所用的新說法並不代表新政策，而只不過是由於總統對許多國際議題不熟悉，不但無法掌握議題的內容，甚至不願意參考專家的意見。

三、奧尼爾辭職原因

闡明奧尼爾是因為反對政府的減稅政策而與布希發生衝突，最後並導致被迫辭職。該書之所以以《忠誠之代價》為名的原因之一便在於：奧尼爾在許多方面，包括政經或外交議題，不僅與美國總統看法不一，甚至認為總統的立場違背經濟學家的常理和基本原則。奧尼爾因職責所在而盡力維持財政部門的順利運作與優良績效，不支持對伊戰爭的大量軍費開

支，尤其更反對布希的減稅計畫，他認為如此將導致美國陷入嚴重的財政困難。這些與布希間因政策理念不合而時常發生的摩擦，埋下奧尼爾日後被迫辭職的種子。

上述是對《忠誠的代價》一書的簡短介紹。雖然，本書對布希政府將引起一股不小的負面效應，但作者蘇斯坎德的目的並非僅在批評布希領導白宮的作風。事實上，就總體而言，本書對布希的批判只是旁敲側擊的，彷彿是在敘述內閣會議以及討論經濟問題之外的一個負面副效應，本書原先的目的更著重在給予奧尼爾一個自我辯論的機會，並從事後解釋奧尼爾在減稅爭執中所扮演的替罪羔羊角色。

雖然，本書並不直接對布希的領導風格與領導能力作出批評，但經由揭露某些重大政策的決策背景與過程，使讀者對白宮內部的荒謬與布希的無能更為印象深刻，加上本書的參考與引用資料已經過法院獨立單位的監察以及確認，具有高度的可信度，因此在揭露白宮內部運作的內幕後，才會引起廣泛的驚訝、憤怒或幸災樂禍的聲浪；尤其本書出版的時機，恰巧時值美國總統的初選，奧尼爾選擇在此敏感的時刻提供不利於布希政府的負面資料，無異於提供民主黨及時而充足的彈藥，也提高本書的爭議性與討論空間。

不過，對於某些要角，如副總統錢尼（Cheney）和國家安全顧問賴斯（Condoleezza Rice）等，本書的言詞較為婉轉，尤其是對於因美國Halliburton石油科技供應公司的案件而受美國參議院調查委員會詢問的錢

尼，其批評的程度似有保留，使筆者難以理解。此案的焦點在於錢尼曾擔任該公司的CEO，而在美伊戰爭後，該公司竟獲得幾十億美金價值的契約，使錢尼須對此間可能存在的利益輸送關係說明自己的責任。CNN曾報導指出，副總統錢尼因為布希領導能力不彰，而獲得掌握權力的機會，手段老奸巨猾且專權用事，但本書對於作為白宮幕後黑手的錢尼，也許是因資料不足而未做出充分的描述與說明，實為一大缺憾。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本書就某些特定議題或政策的立場對許多決策的要角，如：總統的周邊人物、顧問、正副部長、內閣成員等白宮內部具有影響力的人物提出評論，但本書仍不足以否定布希政府總體的有效性和正當性。曾有觀察者指出，布希任內的白宮幕僚體系之管理效率與嚴謹程度遠超柯林頓政府時代，因此本書對布希本身或其政策或有批評與歧見，但對其背後的官僚行政部門，則予以肯定。

總之，雖然本書的大部分議題涉及減稅的爭執與其他經濟問題，不過作者能以深入淺出的筆法，使讀者對布希政府獲得較為深入的了解，且能夠從新的角度觀察美國政府的若干議題。尤其對政治系同學而言，本書可作為課堂上必讀書籍之外的一筆最新且甚有趣的補充資料，因此熱心推薦閱讀。◆

Anne Orford

Read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Human Rights and the Use of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

Tse Lien (連 澤) / Department of Law, LS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debate ove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has raised more questions and ambiguity rather than clarity. Orford, audacious and revolutionary, offers another dimension to the issue in question. Being a distinctive supporter of feminist and critic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is never easy in the sense that international law was largely founded on the basis of European and capitalist tradition.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has long been sidelined and ignored until recently.

Orford, first of all, presents dominant views on the debate over the legality and illegality of humanitarian and interprets both views, pros and cons, as discourses of colonialists or imperialists. In her view, those legal scholars, support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reflect, in some way, the western concept of “saving” third world people or “educating” those from less civilized territory. Nevertheless, these scholars are either unaware or ignorant to this underlying implication on their discourse fo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ose who outlaw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fare no better in Orford’s analysis, which depicts their discourse as a defense for diversified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doing so, international law remains an area of the privileged where dissidents have no access.

書名：Read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Human Rights
and the Use of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
作者：Anne Orford
出版者：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地：Cambridge; New York
出版日期：2003 年
頁數：243 頁
ISBN：0521804647

Escaping from the mudding debate, Orford endeavours to pinpoint the problems laying behind the ongoing discourse ove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She tries to bring readers' attention, through the feminist method, to the concepts, hidden or forgotten in the discourse concerned, such as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This particular method, also under Derrida's influence assumes that international law is not a finished system and it is open to revision and participation which makes justice possible.

The aforementioned method of interpreting international law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ties between power and law. Most legal scholars from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rgue that law is for law's sake and is outside the reach of power. Nevertheless, Orford argues that even if this position stands for the past, it is no longer so, especially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Edward Said's *Orientalism* and Foucault's declaration of "disciplinary power" in contrast to the concept of coercive power, imposed from the sovereign state (the top). For instance, Orford points out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by western international legal scholars, through access to the stories of those people in need and terrorists, is in some way the reproduction of power relations. The imperial desire to get knowledge of them finally turns out to be a sense of expertise and authorization to narrate or speak about stories of those in need of

help from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Where most international legal scholars muddle with the arguments of action and inaction during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since 90s, Orford unveils another half picture of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which has been left out from the debate. Accordingly, Orford contends that much earlier than the outbreak of genocide,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IMF or World Bank have already engaged in the restructuring plan of Former Yugoslavia and Somalia. Their engagement further complicated the whole picture and their strategies, such as the austerity programme and "shock therapy"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led, unavoidably and indirectly, to the later tragedy. While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was blaming the UN for not intervening, the truth was that there have been lots of actions, being carrying out inside those countries, in which many of them failed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o these crises. Those programm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ocused merely on the expectations of those states who granted these aids in exchange for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verhaul in those states.

Orford's inquiry leads us into further discussion over another aspect of the issue,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eties in those countries in question after the genocidal crisis ended.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has taken control over the reconstruction plan in

Bosnia-Herzegovina and a Peace Implementation Council (PIC) was founded by 55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s to monitor and direct the reconstruction in Bosnia-Herzegovina. PIC appointed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to whom broad power was given.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is capable of dismissing officials and banning political parties boycotting the reconstructing plans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y crediting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such a power prevailing over the will of local politicians and voters, democracy would be crippled in the sense that local people are regarded as incapable of exercising their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choosing their own democracy.

In the same vei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functioning of the Trust Fund for East Timor. Right now the most lucrative sectors such as construction and tourism sectors are run by foreigners who pay to their employees, East Timorese; therefore, not surprisingly, an emergent “colonial” domination or, namely, economy is in place. The role of East Timor is to be subordinated to the main actors in world economy through its gradual integration to it.

What Orford is trying to do is to illustrate the ideal way how the West sees the troubled and miserable “Others.” Only through looking at those “Others” and taking military actions to save them, could the West establish and

reinforce their own unified identity which indicates how the world should be. Nevertheless, the dilemma still remain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failure of those military actions and outcome of those humanitarian crises only demonstrate the failed dream of the West and their inability in these areas. These, reversely, threaten their unified identity, which is, as a matter of fact, a misconception of who they really are and in which already includes, inevitably, the “Otherness.”

To sum up, Orford’s work spans through a spectrum of international law, politics, feminist and critical theory. She not only looks into the legality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but also question the very existence and the rationale of it. Her work bridges several disciplines in an attempt to overlook the whole debate ove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t’s too early to say whether there will be more repetition of what Orford depicted in her work but what we could be sure is that her work contributes us another way of thinking about some of the values we deem most important and take for granted in an era of “human rights.” Her work leads us to examine some fundamental issues such as what and who’s human rights we are dealing with and talking about. ◆

張亞中

開放政治市場：全球治理台灣

李 清 / 台灣大學碩士生

開放政治市場乍聽之下，感覺相當不可思議，但是在細細品嚐這本書之後，發現作者對於開放政治市場有一套完整的思考模式，從人道關懷的角度出發，期許開放政治市場的實現，以追求人類的永久和平。開放政治市場主要意涵為：一個國家在仍舊保留自己的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同時，開放別國的政府來管理經營我們的政府。作者從五個角度來探討開放政治市場，並提出其對於台灣的益處。

第一章是契約篇，作者引用了霍布斯、洛克與盧梭的思想，認為他們三人的主張相同的信念，即政府的正當性來自於人民，政府與人民訂下契約，以管理社會，但是契約論卻無法跳脫國家的疆界。契約其實分為兩種：一是人民與國家的契約，一是人民與政府的契約。目前國家仍為世界秩序的主體，我們雖無法擺脫國家，不過我們有權選擇提供人民福祉的政府，不管這個政府來自哪一個國家，這是對民族自決最大的反省。我們應該為自己找尋最好的契約，既然政府只是人民的公僕，為何不能用外國政府作公僕？

第二章為認同篇，作者認為開放政治市場並非割讓，而是讓渡主權中的管理權；並非改變認同，而是建構對全球的多重認同；並非「租借」，因為是在平等互惠的條件下暫交外國管理。作者認為我們可以建構出一種不以消失自我認同為代價的多重認同。台灣的多元化已經建立，但是國家或政治的多元認同則還有一段距離。沒有結構性的制度設計，認同就難以建立，所以應該開放政治市場，並且治理國也應該給予被治理國人民政治參與的權利，這表示雙方都可以經由開放政治市場建立共同重疊認同，因此開放政治市場提供了建構世界多重認同的



書名：開放政治市場：全球治理台灣

作者：張亞中

出版者：聯經

出版地：台北

出版日期：2002年6月初版

頁數：176頁

ISBN：957-08-2439-5

窗口。

第三章為文化篇，中、西文化在過去因為種種因素，一直無法平等交流。開放政治市場恰可讓中、西方進行平等的交流與融合。如果我們相信文化是有機體，就應該讓文化在沒有束縛的環境下成長，建立共同接受的核心價值，台灣若開放政治市場，將可提供東、西方文化全面交流互動的場所。

第四章是安全篇，台灣不能依靠軍事或藉由追求國際空間得到安全，全球化的國際安全機制也不能保障台灣，因此台灣的安全若想被重視，徹底全球化、使台灣進入全球風險社會核心是最有效的方法。唯有開放政治市場，台灣才能與西方強權形成區域經濟體，台灣的安全也同時獲得保障。

第五章為發展篇，開放政治市場可使世界共同成長。由於全球經濟市場已經開放，而落後國家的政經結構無法因應世界潮流，因此中心與邊陲的貧富差距將愈來愈大，唯有開放政治市場、實行政治上的BOT才能解決此困境。若利用西方政府的力量對台灣進行投資與規劃，不僅台灣可成為亞洲營運中心，也有助於西方國家在亞洲的發展。而且開放政治市場也有利於兩岸關係，因為開放後，台灣與中國的交流將立刻完全開啟，而且中國可以藉由台灣得到更多利益。

最後作者提出，開放政治市場以人民為依歸，政府不一定要是「自己人」的，只要人民認為它能帶來自由與幸福。政治市場不應該被壟斷。而且開放政治市場可使全球公民社會形成，產生休戚與共的互動，使台灣人民徹底解放。

整體來說，開放政治市場充滿著理想主義，作者希望藉由開放政治市場，建構人類的多重認同，使東西方文明平等融合，使台灣得到安全保障，讓世界共同成長，建立全球公民社會。但是開放政治市場真的能達到這些目的嗎？所謂的認同，當然有我群與他群的分別，否則就沒有認同的存在！建構世界多重的認同雖然是指在不同情境中有不同的認同，但是政治與國家的認同是無法多元化的，因為人民無法同時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又是外國人，如果治理國受到侵略，是否被治國的人民也要去打仗呢？若是的話就違背了開放政治市場的原意，被治理國與治理國幾乎等同為一個國家。所以國家與政府的認同是無法建構為多重認同的。

而且開放政治市場不一定能夠帶給被治理國更好的未來，因為各國的政治文化與民族特性不同，治理國不一定能夠克服文化隔閡，瞭解何種政策才是對被治理國最好的政策。作者曾經舉香港的例子，以證明先進國家的治理能力，但是也有許多反證，例如斯里蘭卡、印度，也曾經被英國統治過，仍然沒有相當的發展。所以開放政治市場仍有風險存在，應視個案而定。

如果「開放政治市場」可以實行，那麼的確可以達到東西方文明融合，世界共同成長等目的，但是開放政治市場是不可能真正實行的，因為國家與政治的認同是不容侵犯的，一旦由外國人來治理，我們無法確知治理國是真心想幫助被治理國，亦或是想要從中獲利？

治理國的人沒有理由幫助被治理

國，因為他們沒有被治理國的國家認同。最後可能治理國反而害了被治理國的長期發展。作者將政府的擁有者與管理者分開思考，將政府視為一個企業、一項商品，並且進一步開放競爭市場，最後將由好的管理者來經營。但是如何設計出一套機制，以避免治理國圖利，是相當困難的，畢竟政府為人民的公共財，影響之大遠超過一般的企業及商品。

此外，人民的利益勢必與政府管理者的利益相違背，就像雇主與勞工的利益相違背一樣，所以如果缺少了國家認同，將更難以監督政府。再者，從理性的觀點來思考，即使經由條約訂定平等互惠的條件，被治理國必定要付出比治理國更多的優惠，以吸引西方國家來負責管理。作者提出了台灣的地理優勢，可吸引西方來參與管理台灣，但是上海、香港等營運中心開發快速，台灣的優勢已不在。

從契約論的角度來看開放政治市場，以人民為主體，政府本應滿足人民的需求，也應該開放由外國政府來治理，但是現實世界由於國家認同問題無法打破，國家利益依然重要，台灣又沒有足夠的優勢吸引西方先進國家，就連與西方先進國家建立經濟共同體的可能都沒有，更何況是開放政治市場。歐洲國家之所以能夠建立歐洲聯盟，是因為彼此的利益結合，但是台灣與其他國家並非如此。開放政治市場，建立全球公民社會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先進國家並不想要擔負此重責大任，所以人類的最後一道枷鎖，必須等到有休戚與共的問題發生，才能解開。◆

David Shambaugh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廖小娟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以往（甚至迄今），只要是號稱經過科學方法的研究論文，就很少人會懷疑它是否客觀中立，亦不質疑題目本身是否別有意涵，當然，也很少人懷疑「科學」的有效性及意涵；於是許多論述的發展看似理所當然，或是圍繞或維護主流理論的中心假設，更加強了主流理論的權威性，這些發展也很少令人質疑，即使有，也僅止於對基本假設或實質內容意見上的不同，而非針對主流理論的出現及其本身意涵，例如自由主義對現實主義的挑戰，即是在其內容上對抗，而非懷疑現實主義為何出現及其理性假設。

而 David Shambaugh 的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則不同於以往強調美國對於當代中國的認識是如何，或討論中國是什麼，而是提出了對於美國之當代中國研究的質疑與研究之環境因素；此書結合了十八位不一定是中國問題專家，但是其研究或經驗多多少少都與中國有關的學者，以其各自的研究角度，分別探討了在美國的中國研究（學）之環境及條件。書中第一部份介紹美國當代中國研究的演進，在簡介中 Shambaugh 表示區分或者孤立（中國研究）往往會製造出無知，點明中國研究的深刻問題所在，Harry Harding 則用歷史觀點調查有關中國研究或接觸的機構之成長情形，及中國研究社群之知識份子的成熟度，發現研究的內涵和方向，事實上與研究者所處的情境以及所能接觸的資料有關，因此在一九八〇年代前，由於中美無關係，因此資料難以取得，但在其後，則可使用的資源越來越多，甚至可進行田野調查，因此研究的層次和內涵應該得以豐富；第二部分則是關於中



書名：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編者：David Shambaugh
出版者：Washington, D.C.; Armonk, N. Y.
出版地：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M.E. Sharpe
出版日期：1993年
頁數：369頁
ISBN：1563242664

國之各層面的相關研究，有社會、人權、經濟、政治以及安全議題，由各個領域的學者闡述過去及現今在該層面的中國研究進展為何，及其所得的形象又為何？！例如 Gold 認為在中國社會有許多獨特的社會主義組織已經創造出新的社會習慣和行為，但是研究中國的社會學家們卻發現傳統中國的層級性、種族與宗教認同等亦毅然存在，而 Gold 長期以來就以在香港有諮詢者的研究見長，因此也重視「大中國」的社會變遷；再如經濟部分，Prime 則是試圖展示經濟學家如何在中國工作，如何測試與重新定義在中國個案中一般的經濟學理論與模型；而在外交與安全的議題上，從前只能從認知決策過程去推測中國對外行為，但現在則可由內部的資料與程序來探究形成的原因；在這部分又再次證明研究往往與資料的取得有關，研究的題目往往由研究者所能接觸到的訊息以及想要傳達的訊息相呼應。

在第三部份則是論述美國的中國研究社群之各類成員，而 Richard Madsen 認為研究者常被中國及美國的社會潮流所影響；第四部分提到研究中國的挫折，諸如語言學習問題、圖書館資源、學者交換以及研究當代中國的基金費用來源等等，尤其在交換計畫和申請基金支持研究時，常常會直接影響研究的方向，甚至內容與結論！最後一部份則是由 Oksenberg 作結尾，他對於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相當樂觀，尤其在各種學科交叉影響下。

因此本書可以說是完整地介紹了有關中國研究的各種面向，而非僅止於中國研究的內涵，甚至正如

Shambaugh 自己在第一章中所表示：以下各章的角度都是在證明中國研究日益健壯、新穎且有深度。事實上可以說這本書正是為美國多年來的中國研究畫下了折返點，從這裡開始不但在反省美國的中國研究是否有所問題，也企圖開創更大格局的中國研究，而不是將自己鎖在紙上的中國、美國的中國。在這本書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們自我投射的問題，例如在第二部分，作者們分別介紹中國研究的各個主題時，其所判準的標準或者分時期的斷代點事實上就是用美國的角度在思考，以作者便宜行事的方式進行，因此冷戰的結束是一個，中美建交更成了一個重要的指標，但這對中國而言，是否真有如此大的影響或改變呢？況且這樣的分期是否反而會影響到美國學者對於中國當代情況的偏差或者迷思出現，這些都值得再進一步討論！而第四部份作者們認為學者交換或者基金費用申請有問題上，事實上這就與作者本身的期望有關，不管如何在學者交換或基金申請上，都有主辦機構的主觀性，這是許多學者在研究上都難以避免或逃脫的困境，因此這樣的前提下，或許應該詳細調查和討論的是這些主辦機構的做法又如何研究已存的當代中國研究，或許會為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帶來更全面性地自我認識！但不管如何，這本書都為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帶來了省思的第一步，有助於美國學者更全面地認識當代的中國研究背後。◆

凌志軍

變化：六四至今的 中國社會大脈動

林琮盛 /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

90年代初，中國大陸遭遇來自國內與國外的兩股壓力：對內，中國政府必須處理先前經濟發展過熱的遺毒，如貪污腐壞、通貨膨脹、失業下崗問題；對外，必須與西方的民主政治和經濟自由作抗衡。這是中國大陸當時不得不面對的環境結構。同時，也是《變化》一書的落筆點。

凌志軍在刻畫這些現象，甚至評論這些現象確實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尤其身為一位新聞記者，秉持著「筆者筆、削則削」、撰寫春秋之史的直言性格，讓本書在描述事件過程中，更顯得的活潑生動且一針見血，亦讓讀者閱讀完後，有一種痛快淋漓的舒暢感。中國真的在改變了！她逐漸褪去意識型態的激情，取而代之地是，理智、開放與真正的討論。

雖說本書敢言的表現方式令人印象深刻。然而，此書確有一項遺珠之憾：作者對於轟動國內外的「法輪功」事件隻字未提。就此點，吾人的看法是，作者仍擺脫不了中國政治氛圍的侷限性，亦是，要求媒體不得跨越的「政治正確」的那條紅線。故本書的整個架構，嚴格來講，是不脫離中共設下的政治框架：亦是，在遵守改革開放、維持社會穩定、恪守中共為領導核心的政治前提下，挖掘社會經濟的缺失和黑暗，藉由該書來幫助人們宣洩內心對於社會環境的不滿與憤恨感。

因此，吾人為了更深入了解中國政經社會的結構背景，並針對此書描述90年代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現象作評析，故必須尋覓出一條討論的軸線。吾人利用意識型態、制度結構及官僚利益等三方面作



書名：變化：六四至今的中國社會

大脈動

作者：凌志軍

出版者：時報文化

出版地：台北

出版日期：2003年初版

頁數：469頁

ISBN：957-13-3887-7

分析面向，探討整個中國政經局勢的深層意涵。此三個分析角度是互為表裡，彼此交融的：

一、意識型態：搶佔權力的「制高點」

「理論」，在中國是一種至高無上，無可挑戰的力量，這與西方把理論定義為一種只能被討論和豐富的學問不同（請參見本書頁 460），其最重要的因素，就吾人的看法有兩種：一種為長久以來，儒家思想的獨尊不可挑戰的地位，導致百姓甚至於當政者的思維都認為，終極的思想是不可去侵犯和對抗的，這也產生了儒者及一般人只能去補充和解釋思想，卻無法勇敢提出足以挑戰舊有思維的新意的困境；二來是，誰掌握了意識型態的主導權，誰就擁有政治權力。

鄧小平的「實踐論」壓倒了華國鋒的「凡是論」掀起了第一波的思想解放。江澤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個代表論、三講、甚至資本家入黨說，壓制了左派的一絲絲殘留的氣息。這些案例都在說明，中國當政者對於掌握思想解釋權所花的熱情和心力。而當取得政治解釋權後，權威自然建立。反過來，評斷所謂「是」或「非」的標準最後還是來自於政治權威。由此可見，中共的政治權力爭奪形成一種「奪取意識型態解釋權—獲得權力—建立評判標準—形塑意識型態—被挑戰—再奪取解釋權」的過程。而在爭取權力的過程中，總會產生一些衝擊與碰撞，而這些磨合所導致的現象往往會出現有別於許多人（尤其是外國人）認知的意涵及名詞。

二、制度缺陷：政府、市場雙失靈的

元兇

90 年代的中國除了意識型態的交鋒外，經濟成果所帶來的誘惑讓深埋在人們心中追名逐利的慾望一股腦兒地爆發出來、四處宣洩。90 年代最火紅的五熱（投資熱、下海熱、房地產熱、股市熱、開發區熱）讓中國的前景綻放起欣欣向榮的花朵，但美麗遠景卻遮掩了嗜金如嗜血的投資者與老百姓的雙眼（詳情請參見 *The China Dream* 一書），更使得中國人的銅臭味和疏離感加重了許多，產生了一種沒有個人主義的享樂主義人格。冷漠和不信任讓社會運作產生了極大的不確定性。這在本書作者口中，是一種比貪污賄賂、詐騙獵色更可怕的東西。偷拐搶騙，無所不用其極的鑽營求利的行為不只是百姓才會作的，連官員也是樂此不疲。

90 年代的中國社會，正是一個面臨新舊制度彼此衝撞、磨合的時期。舊的制度逐漸在崩解，但還未消失，舊的思維仍然發揮影響力；新的制度和觀念正在茁壯，同時來自國際的壓力也促使新制度和思維的成長。最後，明顯可見地，2002 年的中共十六大其最深層的意涵，是中共在改變自己，它把本身的組織資源和執政基礎擴張至工人農民之外的所有社會階層。用作者的話來說，與其說這樣的變化是建立在全新的理論體系，倒不如說是在瓦解一種過時的組織體系。

三、官僚利益分配：根深蒂固、難以打破的既得利益集團

官僚體系自古有之，其所形成的派系利益共生體亦是中國兩、三千年來上位者亟欲根除，卻越加根深蒂

固、越形茁壯的集團。明清朝的皇帝—尤其雍正皇帝更是痛恨官員彼此間結黨營私、互為朋比—無所不用其極地想剷除嚴重的派系勾結，卻只能無疾而終。

98年朱鎔基正式擔任國務院總理，其中幾件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大事就是端正官員貪污受賄、仗權徇私之風和厲行龐大行政機關的人事精簡。然而，官僚派系的堅固性，並非一朝一夕構築而成，也更非單一「孤臣」能夠回天的。就如同作者所說，這樣的官僚派系集團可解釋為：一支任何盾都無法抵擋的矛，和一個任何矛都無法刺穿的盾。而且，在中國，絕不會發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事。原因就在於，「官官相護」與利益分配時的彼此妥協和支援。

吾人認為，此書最精彩的部分就在於，作者深刻地描述，官僚集團對於百姓的壓榨及自己本身利益的競逐過程中的翔實記載。這些記錄把官僚集團對於權與利的競逐行為刻畫地透徹如生。即便是是鐵面總理朱鎔基，也低估了這個圈子對於人性良知的剝蝕和同化的力量。

結語

中國政治結構的侷限性是根深蒂固，難以打破的。原因就在於，能對當權者權力予以制衡的機制在中國的政壇中幾乎是不存在的，這產生了誰握有權力，誰就擁有龐大的政治資源和利益；同時，搶佔發言權，亦確立了權力的根基，這提供了政治行為者競逐莫大的誘因。在這樣的基礎下，中共的內部民主和政治革新，常是步履闌珊，並受到許多既得利益團體的

制肘，最多在制度的建立和穩固上，有明顯地進展。因此，儘管胡錦濤新官上任，其重心也僅是在「提高政府的效能」，而非大刀闊斧地從事政治民主的革新和進程（請參閱〈擺脫舊官僚 胡錦濤坐穩大位〉，中國時報，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大陸新聞版）。

我們可以從本書和中國大陸的發展脈絡中理解出，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在處理中國面對的議題時，我們不能單純地從表面現象去看待，驟斷中國的總貌就是如此，如官員貪污、人際不信任、思想僵固、經濟發展快速...等。而是要思考，這些問題為何會產生？究竟有哪些因素導致這些現象的產生？而吾人的這三條軸線，或許可以為這本書在分析架構上，提供另一種角度的想法與見解。◆

米歇爾 福柯

性經驗史卷一：認知的意志

邵軒磊 /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

傅柯(1926-1984)從社會學原先所不關注的地方找尋真理，用一種詩意的文體探索存在於社會邊緣的知識形式，批評自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性」，反對將「啟蒙」與「理性、解放、進步」結合起來，而認為「啟蒙運動」實質上是權力的策略操作，也就是統治和控制的形式，而主體和知識都是權力的衍生物。在性史三卷(1976, 1984, 1984)的寫作之中，傅柯批判了當前看似自然的「性科學」，用系譜學的方法探討「快感、肉體、戒律」三者的關係在不同時期的呈現的面貌，依序是「現代」、「希臘」和「羅馬初期」。性史原本在計畫中是一部六卷的寫作，包括了「認知的意志」、「肉體與身體」、「兒童十字軍」、「女人、母親與歇斯底里者」、「性變態」和「人口與種族」，不過在第一卷出版後，傅柯一直沒有按照計畫出版後五卷，直到1984年才又另外出版「快感的享用」及「關注自我」兩卷，而本文所使用的中譯本乃是將三卷合訂的版本。在第一卷中，傅柯為性史(計畫中)六卷作序論上的探討，包括「研究動機」：反對當前的性壓抑假說；「研究主題」：話語和權力的設置；和「研究方法」：考古學。

首先傅柯注意到社會上對於「性」的避諱：「彬彬有禮就是避免肉體的接觸，而用詞得當就是要求淨化語言...以兒童為例，大家要他們忌諱性，禁止去談論，要緊閉雙眼和搗上耳朵，還有禁閉嘴巴。這就是壓抑的實質，他不但禁止對象出現，也禁止去肯定對象的存在性，也就是說：保持沈默。」(Foucault, 1976: 10-11)傅柯對此提出了三個疑問：「首先，性壓抑是一個歷史事實嗎？其次，權力機器在本質上真的是在本質上維護壓抑秩序的嗎？禁



書名：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vol. 1, "La Volonté de Savoir"

(《性經驗史》卷一：認知的意志)

作者：Michel Foucault

(米歇爾 福柯，又譯傅柯)

譯者：余碧平

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地：上海

出版日期：2002年10月

頁數：594頁(其中第一卷120頁)

ISBN：7-208-04324-8

止、審查和否定是權力運作的一般形式嗎？有關壓抑的批判話語為了阻止壓抑是否已經與權力機制交織在一起？或者他不屬於他所揭露的壓抑的歷史網路？在壓抑時代與壓抑的批判是否有歷史的斷裂？」(Foucault, 1976: 18)

傅柯發現權力的運作和話語息息相關，「若是要在現實中控制性，人們必須把他還原到語言裡面，控制他在話語中的自由交流，把他從言談對象中剔除，禁用明顯表現的詞語。」

(Foucault, 1976: 25) 首先是「話語都經過了作為語言警察的新的禮儀規則的過濾檢查。」(Foucault, 1976: 26) 權力機構不只是禁止去說，還有限定怎麼去說，以一種「自白」的方式整合到主體的意識之中，這裡有一部份是自發的，另一部分則是協商的結果。於是「性落入了話語的掌握之中，話語不斷的捕捉他。」(Foucault, 1976: 29) 而「三個世紀以來，西方人的目標就是堅持完全坦白。性話語不斷的增加，這樣的謹慎分析可以對慾望產生轉移、強化、重新定位和改變。」(Foucault, 1976: 33) 十八世紀後在技術上產生了所謂「性話語的中心」：「首先是醫學建立的神經錯亂理論，其次是精神病學透過手淫、性無能或過度和性倒錯的論述，還有法律將風化罪也放入其中，(這些對於性的知識) 透過社會控制滲透到父母子女、夫妻和陌生人的關係之中，提出各種危險，喚起注意，提出診斷、報告和建議，組織各種活動。」(Foucault, 1976: 42-43) 具體而言「坦白」的機制分為五個程序：

首先是一種「使人開口說話」的

臨床規範；其次是必須坦白一切和必須拷問一切的前提；第三是性本身力量的潛在性，需要由「知識」來發覺；第四是透過詮釋的方法，性話語是有兩部分構成的，說話者知道他的表象，但不知道他的真理，聽話的人對表象一無所知，但是知道真理，他需要聆聽敘述來揭示坦白。最後是將坦白醫學化，性的範疇不只是「對/錯」、「好/壞」，而是帶入「正常/異常」(Foucault, 1976: 89-91)。

推動性知識和性話語的展開是由於權力的轉變，傅柯在這裡區分了「古典/現代」權力，古典權力作為「徵收」的具體化而實踐：表現在稅收、強迫勞動、肉刑和死亡上，權力以單純的佔有形式來運作，權力主體與客體是對立且其個體性必須具存，保證存有的理由是為了加以剝奪。但是現在權力是對生命的積極管理、增加、控制和調節。肉體表現在做為機器的規訓上，包括對姿勢的要求、能力的提升，力量的運用模式等等的程序，「紀律」這個字便是作為「解剖學的政治」而建立的。其次是將肉體作為物種生命的承載物來建立的政治，這是以數字為中心的壽命、出生死亡率、健康指標、環境指標和人口的調整政策的「生物學的政治」，權力在這兩種面向上都需要性話語的知識。◆

藤原歸一

民主帝國： 美國、戰爭、現代世界

葉俐吟 / 東京大學碩士生

藤原歸一這本著作的主旨在於提出美國在後冷戰時期對於外交政策的摸索，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走上帝國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書中指出九一一事件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以及美國走上帝國的單邊外交政策後，將對國際社會帶來何種衝擊，文末指出國際社會應該盡力使美國避免走向帝國政策，而應回歸國際協調機制。

根據 Michael Doyle 對帝國 (empire) 概念的定義，帝國指某政體對於另一政體的國內外政策以及國內政治體制具有控制的影響力。亦即，某政體對於另一政體的統治者的選任及統治者的行動有控制的狀況。根據這個定義，對於帝國的定義並不限於領土的支配。實際上，此概念的帝國包括了殖民地統治的「正式的帝國」，以及不進行直接統治的「非正式帝國」。依此定義則現在的國際實際上可謂為美國主導的為「非正式帝國」型態。其基礎就在於，美國對於世界各地域所擁有的影響力，以及遍及世界各地的軍事基地網絡，和基本上與美國外交政策同調的同盟國。

美國在冷戰結束後，不停地摸索其外交模式。2001 年 911 事件成為美國正式轉向帝國的導因及客觀指標。進入後冷戰時期，能夠與美國在軍事實力上競爭與匹敵的國家已不存在，然而由於權力的集中（於美國），也相對得使美國向外擴張行使權力的動機減弱。這樣的客觀狀況下，在符合美國利益並且不會造成過大負擔時，相對於保持單獨的優勢地位，美國反而較重視多國間的秩序形成。然而在摸索形成多國間秩序的時，不具有軍事競爭對手的

書名：民主帝國 - 美國、戰爭、
現代世界 -

作者：藤原歸一

出版者：株式會社 岩波書局

出版地：上海

出版日期：一刷 2002 年 9 月 20 日

七刷 2003 年 10 月 6 日

美國，仍然存在著朝向單邊主義發展的選項。美國 10 年以來一直自制不要走上單邊的帝國政策，但 911 成為美國放棄這種自制而走上帝國政策的關鍵；911 事件對美國政治上造成三個影響，而這三個影響使得美國正式成為「帝國」：第一、本土防衛與區域介入的結合。以布希上台時的國際利益定義而言，美國以本土防衛至上，對於離美國本土遙遠的其他區域的介入相當消極，然而 911 事件徹底改變布希的政策，展開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區域介入；第二、美國輿論的團結。美國國內輿論對於美國政府對國外區域性的財政或人員涉入向來抱持反對消極的態度，特別是冷戰結束後，對外的軍事介入或區域紛爭的調停更是沒有人氣的議題。然而 911 事件使得美國全體輿論以及朝野政黨的意見統合；第三，戰爭與正義的結合。布希政權將世界二分為善與惡的世界，以軍事優勢地位的背景及影響力，要求世界各國「選邊站」（正義或邪惡），造成世界各國外交政策選項及彈性的減少。

當大國開始傾向帝國發展時，將會發生下列幾個問題。其一為，國際社會傾向對於大國單獨行動的依賴，而對於國際組織解決問題的依賴降低，造成國際機構的空洞化及公共領域的解體。第二，各國政策選擇性及其多樣性的否定。經歷兩次世界大戰與冷戰，各國對於美國及國際關係的關聯上抱著美國不要再走向孤立主義的期望。因此在冷戰結束後，美國仍維持在世界多處的駐軍。然而，對於美國而言，除了孤立主義及國際協調主義之外，由於具有與其足以相提並

論的競爭者所沒有的軍事實力，因此仍存在單邊主義的選項。冷戰後，正是重建國際秩序的關鍵時刻，這十多年來一直處在摸索的階段，此刻更是國際社會各國應共同努力，避免美國一路走向帝國的單邊主義，重回建設國際主義及國際合作協調機制的關鍵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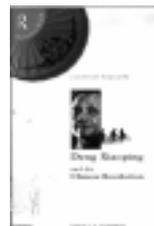
David Goodman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曾拓穎 /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

澳洲雪梨科技大學教授 David Goodman 的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在閱讀之後讓人覺得如沐春風，David Goodman 曾就讀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倫敦大學和北京大學，現在也是 *China Quarterly* 的編輯之一，他的鄧小平傳記除了考證十分嚴謹外，跟一些記者所撰寫的鄧小平文章相比，更多了點學術性。David Goodman 的兩個觀點很值得我們注意：一是西方認為經濟帶動的民主轉型並不適用於中國；二是反駁鄧小平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的論點。

本書第一章提到鄧在西方人眼中的兩個形象，一個形象是資本主義世界完全可接受的共產主義維新派。這種形象，首次出現在西方人的眼中是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在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之前，鄧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拋棄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強加在中國人頭上的政治枷鎖，制定了現代化的藍圖和政治改革方向。中國急需在國外和對外關係中改變它的形象。鄧小平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他在聯合國發表演講，以政府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出訪美、日、西歐和東南亞各國，在休士頓，鄧小平戴著寬邊高頂的牛仔帽在電視上露面，使人們覺得他的中國不再具有危險。鄧小平，就像一個和藹可親的大叔，受到大家的喜歡。對於美國政府來說，在對蘇聯的戰略中，鄧領導下的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同盟，美國政府隨時可以打中國牌。1979 年鄧甚至被提名為美國《時代》雜誌年底的世界風雲人物，這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首次獲得此項殊榮。鄧的第二個形象，西方一些人不大喜歡，那就是 1989 年 6 月 4 日天安門事件所留給西方人的複雜印象。



書名：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作者：David S. G. Goodman

出版者：Routledge

出版地：London; New York

出版日期：1994 年

頁數：209 頁

ISBN：0415112524

在西方，有一種傾向認為經濟現代化運動一般是與民主政治的出現形影相隨，這種情況可能會在中國發生，但在毛後的時代倡導經濟現代化的人未必就是政治上的開明人士，只是這些人願意經濟發展而不願意搞階級鬥爭。西方將民主轉型的經濟社會理論套到中國來，顯然不適用，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無論鄧、胡、趙，儘管在處理民主運動的手段不一，但是追求穩定的目標是在的，只是最後胡、趙無法處理改革的後座力，逼得鄧用他自己的方法來維持穩定。鄧不像西方所設想，經濟改革者不一定是政治改革者，套句電影英雄裡的台詞，西方人把鄧小平想簡單了。

Goodman 的第二個論點是認為鄧小平是重實效，但並非實用主義者，鄧有一套自己的思想體系，有對中國的規劃藍圖，鄧在他的講話和著作中反覆強調具體時間、具體情況要具體對待。一些評論家說鄧從來就沒有什麼原則和政治見解，Goodman 認為若照此推論，鄧在文革時就不至於遭到整肅了，真的沒有原則與政治見解的是周恩來，周在政治上始終不渝地追隨毛主席的腳步，當然他也扮演了毛和其他幹部緩衝的角色。而鄧雖然會遵守黨、毛的決定，但是他並非沒有自己的一套看法，鄧對如何進行中國的現代化，和中共應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起什麼作用，肯定有一種獨到的見解，正因為如此，使他的對手有罷免他職務的機會和藉口。

Goodman 在本書結尾的結論我覺得很精彩，特地引用以跟大家分享：

「從鄧對 1956 年八大歷史功績的再次肯

定，和強調八大路線的正確來判斷，他在中共的傳統中尋求改革的正統性。八十年代期間，八大被說成是一次模範的代表大會，並且重新出版了精裝和平裝的八大文獻，鄧和其他領導人認為八大堅持了黨的傳統，特別是堅持了毛澤東思想。當然，八大所堅持的毛澤東思想與鄧在八十年代所解釋的毛澤東思想一點也不矛盾，完全是一致的。但是，有點使人感到不解的是，當時正是鄧正式向八大提出了修改黨的章程，這次黨的章程的修改，刪掉了涉及有關毛澤東思想的內容。

鄧以這樣的方式尋找傳統，突出暴露了他在社會與政治改革中的主要矛盾。鄧的傳統主義使他把注意力集中於尋找中共的黃金時代—可能是 1956 年，也可能是四十年—以此來證明現代中共政治的正確。然而，那種黃金時代未必長期存在過，或許僅僅是在某種特殊情況下存在過，如抗日戰爭時期在革命根據地。由這樣的歷史或傳統形成觀念，面對如此劇變和不同的環境時，其本質就決定了它是不會有太大的靈活性。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間，由於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新的社會與政治的要求，在這樣的情況下，需要的是適應而不是鄧的那種原則性的反應。鑑於此，隨著時間的推移，鄧要麼將作為最成功的經濟現代化的制定者，要麼將作為不太成功的政治改革家被載入中國革命的史冊。」◆

【徵 稿】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之反省對話，推動全國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與「書目」，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投稿須知

■徵稿對象：全國政治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稿件內容：

- (一) 書評：針對政治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內容引介），約 2000 至 2500 字。
- (二) 書目：針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介紹，約 1000 至 1500 字。

■截稿日期：每年二、四、八、十一月十日以前。

■發刊日期：每年三、六、九、十二月五日。

■稿件筆潤：

- (一) 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元整。
- (二) 書目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元整。

■本刊物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唯保留此項權利；本刊保有重複運用稿件權利。

■投稿暨聯絡方式：

(一) 電子郵件：PolisciReview@ntu.edu.tw

(二) 一般郵寄：台北市中正區(100)徐州路 21 號

臺大政治系[政治科學季評]編輯委員會

